

## 圣经与现代以色列民族国家的构建\*

钟志清

**内容提要** 古代希伯来经典圣经在现代以色列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 18 世纪犹太启蒙运动中，欧洲犹太思想家把圣经经典从宗教引入世俗，并与振兴犹太民族文化传统的理念联系起来，在犹太人与巴勒斯坦土地之间建立一种联系。19 世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后，圣经逐渐被世俗化和政治化，教育家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运用圣经在土地与人、历史与现在之间建立一种合法性的联系。以色列建国初期，以本-古里安为首的政治领袖开始强调圣经在国家政治与国民教育中的重要性，圣经成为塑造新型民族身份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六日战争”后，圣经的历史与世俗意义逐渐削减。新世纪以来，由以色列考古学家引发的关于圣经史实确定性问题的争议使圣经再度成为学界与公共对话中的一个焦点。

**关键词** 圣经 犹太复国主义 以色列 民族国家构建

**作者简介** 钟志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圣经<sup>①</sup>是古代居住在西亚地区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所共同尊崇的一部圣典，随着希腊文本“七十子译本”和拉丁文本“武加大译本”日益西渐，对整个西方文明产生了影响。不过在犹太世界里，尽管圣经中的许多叙事与犹太人的日常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在 19 世纪之前，圣经对犹太人日常生活的影

---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希伯来圣经学术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为本文的修改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① 本文所提及的圣经指希伯来圣经，即《旧约》。文章中圣经中的引文来自和合本。

响远远比不上《塔木德》和其他拉比文献。犹太人自从公元 135 年的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后，就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在流散地，犹太人往往通过古代拉比释经的著述来研读圣经，有些犹太家庭连一部完整的圣经都不收藏，至多保留《摩西五经》和《托拉》，许多犹太人对圣经知之不多，甚至形成了“现代犹太人失去了圣经——必须将其寻回”之说。<sup>①</sup>

19 世纪末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以来，圣经逐渐被世俗化和政治化，教育家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圣经在土地与人、历史与现在之间建立起一种合法性的联系；以色列建国后，以本 - 古里安为首的政治领袖开始强调圣经在国家政治与教育中的重要性，使圣经成为塑造新型民族身份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一度在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六日战争”以来，随着以色列征服了耶路撒冷老城、伯利恒、希伯伦等圣经中描绘的“圣地”，圣经在以色列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位置逐渐发生了变化。此类问题日前已经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以色列历史学家、海法大学教授阿妮塔·沙培拉探讨了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 - 古里安（1886 - 1973）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里，致力于借助圣经塑造年轻以色列国家历史意识，以及圣经经典在以色列人身份塑造过程中的兴衰。<sup>②</sup>另一位以色列历史学家、特拉维夫大学教授亚考夫·沙维特分析了过去 200 年间希伯来圣经在犹太文化中的作用，以及不同历史情境下的圣经学者和公共人物对圣经文本的研究解读<sup>③</sup>。美国学者阿兰·列文森教授的专著<sup>④</sup>论及德国、以色列和美国十位学者对圣经与犹太身份的研究。加拿大学者努尔·马萨尔哈在《圣经与犹太复国主义》<sup>⑤</sup>和《犹太复国主义圣经》<sup>⑥</sup>中则从巴勒斯坦裔学者的视角探讨以色列国家如何运用圣经杜撰历史，挑战着犹太民族主义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但时至今日，中国学界对这一问题尚未问津。

---

① Yacov Shavit, *The Hebrew Bible Reborn: From Holy Scripture to the Book of Books*, trans. , Chaya Naor,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7, p. 1.

② Anita Shapira, “Ben - Gurion and the Bible: The Forging of an Historical Narrativ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3, No. 4, 1997, p. 647; Anita Shapira, “The Bible and Israeli Identity”, *AJS Review*, Vol. 28, No. 1, 2004.

③ Yacov Shavit, op. cit.

④ Alan T. Levenso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Jewish Bible*, Lanham :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 2011.

⑤ Nur Masalha, *The Bible & Zio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2007.

⑥ Nur Masalha, *The Zionist Bible*, Durham: ACUMEN, 2013.

## 圣经与犹太启蒙运动

要审视圣经在现代以色列民族国家创建过程中的作用，应该简要追溯 18 世纪以来圣经在犹太世界中角色的变化。兴起于 18 世纪下半叶的犹太启蒙运动，将“回归圣经”（Returns to the Bible）当作犹太教现代化与复兴犹太民族的先决条件，<sup>①</sup> 引发圣经在犹太世界里的角色的变化。从 18 世纪末期到 19 世纪初期，西欧犹太世界开始把圣经当成有助于形成犹太文化精髓的文献，先是将圣经、《密释纳》和《塔木德》及其评注相提并论，而后逐渐取代了《密释纳》和《塔木德》的位置。导致圣经领域这场革命性变化的中心人物是著名的犹太启蒙思想家门德尔松（1729 - 1786）。门德尔松与人合作，借鉴了路德的德文版圣经、加尔文的法文版圣经以及钦定本的英文版圣经，把圣经从希伯来语翻译成德语。在所翻译的《摩西五经》评注里，他根据犹太传统解说圣经，创造以圣经为中心的犹太生活指南。门德尔松希望是圣经、而不是拉比文学（《塔木德》和《密释纳》）在欧洲犹太人的生活中占据中心舞台。这是因为，在犹太人广袤的文学世界里，毕竟是圣经成为犹太学者与其他传统共享的神圣文本。<sup>②</sup>

门德尔松的圣经翻译，影响极其深远，它开创了德国犹太人的乡土文学，使得圣经在下一世纪赢得了经典地位，关于圣经的评注突破了一直禁锢着德国犹太人生活的《塔木德》研究的圈子。<sup>③</sup> 19 世纪，圣经出现在欧洲的犹太会堂、书屋和评注中，进入了学校，接着演化为纯文学，走进戏剧与艺术殿堂。从此以后，圣经不光是传统解经学上的评注主体，而是变成优秀的文学作品、“世俗的”民族历史和宇宙伦理之作，忠实地反映了圣经时代以色列地（Land of Israel, Eretz Israel）的现实，并被视为指南。它启迪了不可胜数的文学与艺术作品，为诸多意识形态提供了合法的依据，为想象中的未来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画面。<sup>④</sup>

① Yacov Shavit, op. cit., pp. 1 - 2.

② Alan T. Levenson, op. cit., pp. 42 - 43.

③ [英国] 西塞尔·罗斯著；黄福武、王丽丽等译：《简明犹太民族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404 ~ 405 页。

④ Yacov Shavit, op. cit., p. 36.

门德尔松及其门生倡导复兴圣经希伯来语，客观上强化了犹太人同巴勒斯坦土地的历史联系，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架构了一座桥梁。这是因为，希伯来语是能够体现古代以色列民族辉煌的语言，具有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所说的“神性”，<sup>①</sup>能够在现代犹太人与古代先祖所居住的土地上建立关联，并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当时欧洲的非犹太世界尊重圣经时期的犹太人但蔑视其后裔的思想。<sup>②</sup>尽管当时犹太民族这一概念尚未形成，但复兴圣经希伯来语的举措无疑强化了犹太人这一特殊族群的集体意识，并且拉近了圣经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激励一些作家用圣经希伯来语来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表达流散地时期的犹太人与巴勒斯坦土地具有密切关联的理念。

一些犹太启蒙思想家借助圣经笔法，用文学作品描写圣经时代的生活，表明犹太人和土地的关系。玛普（1808 - 1867）的长篇小说《锡安之恋》（1856）不仅使用了大量的圣经语言，而且以当时的历史学著作为基础，描述了想象中圣经时代的锡安，唤起了流散地犹太人对祖先生活过的土地的向往。作为启蒙时期的思想家，玛普把小说作为观念的载体，把男女之爱、民族兴亡之感、故园之恋等情感与惩恶扬善、回归故乡的理念有机地结合。《锡安之恋》所体现的圣经、民族与土地关系的理念，对日后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尤其是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产生了重要影响。本-古里安曾经回忆说，年轻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两部作品是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和玛普的《锡安之恋》。前者激起了他对农奴制的仇恨；后者则加剧了他对锡安的渴望。<sup>③</sup>

## 圣经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19世纪末期，在欧洲民族主义运动崛起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圣经的世俗化意义愈加凸显。早期的犹太民族主义理论家认为圣经中蕴含着民族价值，因而把圣经视为具有创造性的民族天才的表达。圣经角色于是从犹太启蒙运动时代的凝聚犹太民族精神的天然磁铁变成塑造现代犹太民族意识的基石，

---

① J. G. Herder, *Against Pure Reason: Writings on Religion, Language and Histor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3, pp. 158 - 174.

② 钟志清：《希伯来语复兴与犹太民族国家建立》，载《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119~121页。

③ Anita Shapira, “The Bible and Israeli Identity”, *AJS Review*, Vol. 28, No. 1, 2004.

能够促使现代犹太人在观念和行动上与古老的巴勒斯坦土地建立联系，既培育犹太人热爱巴勒斯坦的情感，树立生存在那里的信念，又有助于彰显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合法性。

### （一）圣经：联结人、土地与语言的纽带

犹太民族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相辅相成。早期的犹太民族主义理论家和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流亡中的犹太人与圣经所描绘的土地——巴勒斯坦土地之间的联系。摩西·赫斯（1812 - 1875）既是犹太民族主义理论家，又是犹太复国主义先驱，他指出圣经表达了犹太人独特的创造力，<sup>①</sup>认为犹太人不是一个宗教团体，而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一个特别的民族；甚至提出返回故土，即巴勒斯坦的犹太国的主张。<sup>②</sup>在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赫茨尔（1860 - 1914）眼中：“巴勒斯坦是我们记忆中永存的历史家园。巴勒斯坦这个名字本身对我们的人民就有着极其强烈的吸引力。”<sup>③</sup>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表人物阿哈德·哈阿姆（1856 - 1927）则主张圣经是形成犹太人“民族自我”的一个重要因素，用数以千计的毛细血管把犹太人和历史过去联系起来。<sup>④</sup>现代希伯来文学成为宣传犹太复国主义主张的载体，一些深受犹太复国主义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和诗人运用《圣经》中的预言模式来宣传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如素有犹太民族诗人之称的比阿里克在1891年发表了著名的诗歌《致飞鸟》，表达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渴望之情，以及怀恋故土的民族情感。

犹太人在近2000年的流亡过程中一向将“明年耶路撒冷”作为一种精神追求，直到19世纪末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以后才把精神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这一观点我们从阿拉伯学者的著述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出生于以色列的巴勒斯坦裔学者和作家穆尔·马萨尔拉在其2013年问世的《犹太复国主义圣经》一书中论证说：在过去的2000年中，“圣经土地”或者巴勒斯坦，一直没有成为犹太人的重要中心。尽管在犹太人的想象中，圣地是一个中心，但没有转化成为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人口的、文化的和思想现实。<sup>⑤</sup>

① Yacov Shavit, op. cit., p. 39.

② [美国] 沃尔特·拉克著；徐方、阎瑞松译：《犹太复国主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2 - 63页。

③ [匈牙利] 西奥多·赫茨尔著；肖宪译：《犹太国》，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8页。

④ Yacov Shavit, op. cit., p. 41.

⑤ Nur Masalha, *The Zionist Bible*, Durham: ACUMEN, 2013, p. 89.

犹太复国主义从理论转向实践是在1882年。1881年发生在俄国的针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直接导致了1882年的第一次犹太移民运动（又称“阿里亚”），来自俄国、东欧的约25 000名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sup>①</sup>新移民尽管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拼搏付出，但最终因生存条件恶劣多数人选择了离开。不过，需要提及的是，早在1881年，深受犹太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激励的俄裔犹太人巴鲁赫·本-耶胡达便移居巴勒斯坦，致力于复兴希伯来语口语，并设想把希伯来语作为未来以色列国家国语事业。本-耶胡达意识到，现代民族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拥有一门民族语言，语言是把民族凝聚在一起的重要手段，是民族集体身份的一个标识，因此犹太人不仅要拥有土地，而且要有一门民族语言。显然，这片土地便是巴勒斯坦，这门语言便是希伯来语。<sup>②</sup>至此，犹太民族国家理念中的立足之本：人、土地与语言等重要因素基本成型并逐渐固定下来，而圣经可说是把犹太人、巴勒斯坦土地和希伯来语联系起来的一个纽带。

1904年至1913年间，在社会主义和回归土地理念的影响下，大约40 000名年轻的犹太拓荒者从俄国、波兰等地移居巴勒斯坦，他们当中有政治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大卫·本-古里安和伯尔·卡茨尼尔森，这便是第二次犹太移民运动。圣经在第二次犹太移民运动时期的作用十分特殊，赋予年轻的犹太民族主义运动一种神话历史基础，强化了犹太人在古老土地上的特殊位置。当时，几乎每一位劳动者的房间都有一部圣经。它提醒从流散地抵达巴勒斯坦的年轻拓荒者们记住以色列之地（即巴勒斯坦）就是故乡，使人与土地的关系更为密切。尤其作为第二代移民，手持圣经，赤脚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行走，会与古人产生一种认同，就像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以色列政界领导人塔滨金所说，“圣经作为某种出生证，有助于撕下个人与土地之间的隔膜，进而滋养一种‘家园意识’。”<sup>③</sup>现代犹太人与巴勒斯坦土地之间的肌肤相亲，并非是宗教上的某种契合，而是延续着犹太启蒙运动以来带有的浪漫色彩的民族觉醒

---

① 参见潘光、余建华、王健著：《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4页；又参见张倩红著：《以色列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143页。

② Alain Dieckhoff, *The Invention of a Nation: Zionist Though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srael*, Trans. Jonathan Derick,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3, p. 102; see also Ron Kuzar, *Hebrew and Zionism: A Discourse Analytic Cultural Study*,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1, pp. 73-81.

③ Yizhak Tabenkin, "Ha-mekorot" in Berakha Habas, ed., *Sefer ha-aliyah ha-sheniyah*, Tel Aviv, 1947, p. 27.

传统。<sup>①</sup> 圣经不再像启蒙时代作家玛普笔下描述的那样只流于一种文学想象，而是与山川湖泊等地理名称、事件和人一起变成确实实存的存在。希伯来语作家和诗人使用圣经用语来描绘新移民在伊舒夫（以色列建国之前巴勒斯坦的犹太居民点）寻找自身位置时所面临的情感与挑战，乃至对以色列地的无限热诚。

## （二）圣经教育与圣经之争

与此同时，圣经教育在巴勒斯坦的新犹太文化教育中开始发挥作用，并且逐渐被纳入到犹太民族国家建立的意识形态建构之中。最早将圣经历史教育与当下民族意识结合起来的应该不是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家，而是以色列地的教育工作者，或者可说是持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教育工作者。早在19世纪80年代，在莫沙夫的希伯来学校里已经开始教授圣经，并且带有强烈的世俗色彩。讲述圣经的目的在于讲述历史，而不是讲述摩西戒律。20世纪初期，赫茨利亚中学在圣经的世俗化教育方面做得非常突出。赫茨利亚中学1905年建立于雅法，1911年迁到新建城市特拉维夫郊外。学校不但举行各种文化活动，并且用希伯来语授课。而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选用希伯来语就等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赫茨利亚中学称得上是世俗希伯来教育的一个制高点。更引人瞩目的是，以校长莫辛松（1878-1942）为代表的个性派教育工作者公然强调用世俗化方式来讲授圣经。而在传统的犹太教育中，《摩西五经》之外的东西往往被忽略。莫辛松校长主张，圣经可以成为了解生存在这里的古代希伯来人的政治、社会与道德生活的知识来源。那种生活一定要清晰地呈现给新希伯来人，使得圣经不断地激起其民族自豪感，尊敬过去，对未来充满信心。授课顺序也有所调整，如先教《约书亚记》，而后再教《创世记》<sup>②</sup>。这一具有现代色彩的举措遭到了保守派的严厉批评。于是自1911年开始，围绕在以色列地的学校里如何教授圣经，尤其是在中学教授圣经这一问题爆发了著名的圣经之争。

表面看来，论争围绕着是否允许学校老师依据底本假说（Documentary Hypothesis）来讲授圣经展开，实际上牵扯到如何确定圣经在巴勒斯坦的新文化教育中的作用的大问题。而争论者对圣经角色的分派恰恰反映出伊舒夫对传统和大流散应该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sup>③</sup> 带有革新意识的莫辛松校长认为：

<sup>①</sup> Anita Shapira, "Ben-Gurion and the Bible: The Forging of an Historical Narrativ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3, No. 4, 1997, p. 647.

<sup>②</sup> Alan T. Levenson, *op. cit.*, pp. 112-114.

<sup>③</sup> Yacov Shavit, *op. cit.*, pp. 373-374.

圣经是民族教育的基础，是民族历史的组成部分。在学习圣经时，有必要学习圣经及其各卷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史，要区分历史书、先知书、诗歌和律法。要剥下圣经的宗教和启蒙的外衣，犹如大流散时期那样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对圣经加以接受。在他看来，圣经不只是一部宗教研究的著作，因为圣经还涉及其他问题，也许这些问题比宗教问题更为重要：在圣经中，我们发现了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时期犹太人撰写的具有独创性的民族文学，此乃圣经价值之所在。<sup>①</sup> 但以大拉比亚伯拉罕·哈科恩·库克为首的正统派犹太教徒则认为高级中学的老师是以欧洲流行的方式教授圣经，失去了犹太教的灵魂。<sup>②</sup> 即便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内部，也有不同看法。犹太文化复国主义者的代表人物阿哈德·哈阿姆赞同莫辛松把圣经视为犹太民族历史组成部分的说法，但在他看来，重新建构圣经各卷书系顺序的做法则有悖于圣经乃民族创造之说，也不适合希伯来民族学校的教育方式。研究圣经在中等学校里没有位置。学生们必须熟悉《摩西五经》和整个圣经；他们必须不能这里得知一些片段，那里得知一些段落。无论宗教还是普通常识都无法理解这种实践。那是世俗犹太学者的仿造，而不是圣经知识。<sup>③</sup> 另一位犹太复国主义作家扎尔曼·爱泼斯坦则认为赫茨利亚中学教授圣经采取的方法是把圣经当成了世俗文学。这种做法适用于大学，而不适用于中学。<sup>④</sup>

在学校从事教学实践的老师则把争论焦点引向如何对待大流散时期宗教的核心问题，在他们看来，整个宗教带有流亡性质。而希伯来圣经不是大流散期间犹太人的圣经，不是带有拉什评注，米德拉西解说等内容的圣经，而是原典圣经，完全摆脱了流亡环境。<sup>⑤</sup> 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在整个圣经学术发展历史上只是一个象征。但它反映出一种倾向，即现代自由思想家反对按照文献假说的原则来教授圣经，不但怀疑这些假说与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在世俗氛围中阅读圣经无关，并且表达了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试图借圣经教育摆脱大流散的困扰，并把这种理念传达给下一代。

---

① 莫辛松博士的这些见解出自他在 1910 年发表的文章《在学校教授圣经》中，See Yacov Shavit, op. cit., pp. 374 - 375.

② Yacov Shavit, op. cit., p. 375.

③ Ahad Haam, "Between the Extremes", in *Hashiloah*, 21, December - January, 1913. See also, Alan T. Levenso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Jewish Bible*, p. 113.

④ Yacov Shavit, op. cit., p. 376.

⑤ Ibid., p. 378.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以色列的多数教材都由具有东欧背景而后移居巴勒斯坦的老师来写。多数教材不仅要讲述历史，而且要讲述犹太复国主义价值。学习圣经进而成为把民族神话的过去与拓荒者的现在结合起来的一个中心工具。在普通教育系统中的高中，比如说，每周要学 35 个小时圣经。教育学家巴鲁赫·本-耶胡达说，任何不以圣经为基础的犹太复国主义建构，就像搭起来的火柴杆，一阵轻风就会将其吹落。就这样，学校就可以从新的，世俗的，民族主义角度，而不是从宗教信仰或者是哲学工作的角度学习圣经。通过再现圣经故事，在圣经传说与以色列地伊舒夫的现代生活之间建立一种联系。<sup>①</sup> 换句话说，即使教授圣经，也不是教授宗教信仰，或哲学观念，而是要大力渲染圣经中某些章节的英雄主义思想，讴歌英雄人物，使古代以色列民族富有神奇色彩的过去与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推崇的现在奇异般的结合起来。举例说来，教育学家尤里诺夫斯基建议在讲授《耶利米书》第 24 ~ 42 章关于耶利米反对犹太人发动反抗巴比伦人的行动时，要强调耶利米为民族生存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先知耶利米为故乡命运、民族生存、犹太王国余民以及巴比伦流亡忧心忡忡，在时下这个动乱的年代，这些做法可以指导人们为争取在祖先生存过的土地上而奋斗。<sup>②</sup>

有趣的是，当时的圣经历史教育把着眼点置于张扬犹太古代民族历史的辉煌，而不是今人与土地的联系。至于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本-古里安本人，他在第二次犹太移民浪潮时期来到以色列地，总体来看，在他这段生涯中，圣经及其叙事的政治意义并没有过多地被凸显。19 世纪 20 年代，本-古里安讨论了巴勒斯坦边界问题，从《摩西五经》和《塔木德》中提取证据：他在这里的系统阐述事实而具体，但是几乎没有论及圣经或历史。其定位着眼于将来。本-古里安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两部政论集《从阶级到人》以及《我们和我们的邻居》基本上未曾包括古代史。<sup>③</sup> 30 年代下半叶开始，本-古里安在一些作品和宣言中意识到犹太人与土地之间的历史联系，甚至在皮尔委员会证词中，他发明了一句名言：委任统治不是我们的圣经，而且，圣经给我们委任。但当时，圣经修辞与圣经母题在他的话语中还是比较罕见。倒是他的合作者卡茨尼尔森从 30 年代早期便致力于创造一种与犹太文化传统联系起来的事业。<sup>④</sup> 而另

① Oz, Almog, *The Sabra: the Creation of the New Jew*,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 27.

② Ibid., p. 28.

③ Anita Shapira, op. cit., p. 648.

④ Ibid., p. 651.

一位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雅博廷斯基则在 20 年代末期撰写了反映圣经题材的小说《参孙》，把圣经故事世俗化，祛除了英雄人物身上的某些超自然因素，凸显出为民族主权而战的意义。

## 圣经与以色列建国后的政治与社会

在创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创建者和决策者有必要强调其民族的独特性，或者在国民与其共同遗产，即语言、土地、经典、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之间建立联系。<sup>①</sup> 圣经作为犹太民族经典，对以色列建国后意识形态的构成影响很大，涉及政治、宗教、律法、文化等多个层面；而对新建国家的政治影响尤甚。鉴于新建以色列国家在炮火中形成，缺乏现代立国传统与治国经验；因此，欲在世界格局与阿拉伯国家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一方面要借助于外来势力，一方面要借助自己国民的力量，而将国民凝聚起来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让国民，尤其是青年一代了解古老民族的文化遗产和英雄主义行为。圣经在这方面无疑成为以本 - 古里安为首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的灵感来源。重视圣经及其教育既有助于为时下民族国家找到生存的合法性依据，又可以强化国民身份。

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圣经中带有军事征服色彩的历史叙事日渐众多地被以色列用来激励以色列年青一代士兵去战胜阿拉伯人，维护新建犹太民族国家的合法化与生存权，尤其是鼓舞以色列军队的士气。而从巴勒斯坦学者的视角来看，这样的做法等于用圣经叙事来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殖民。<sup>②</sup>

1948 年战争似乎也成为本 - 古里安本人与圣经关系的转折点。他曾指出：以色列的再生与“独立战争”将圣经像一道新光展现在我们面前。翻看之后，我联想到以色列“独立战争”以及定居点等诸多问题，想到了历代以色列评注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一些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说，民族、部落、征服、战争、地理、以色列、定居点、母语等概念都是抽象的。<sup>③</sup> 此话一方面显现出

---

① Michael Keren, *Ben Gurion and the Intellectuals: Power, Knowledge, and Charisma*, Illinois: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04.

② Nur Masalha, *The Zionist Bible*, p. 104.

③ David Ben - Gurion, ed., *Ben - Gurion Looks at the Bible*, trans. Jonathan Kolatch, London: W. H. Allen, 1972, pp. 113 - 125.

本-古里安作为政治家对国家主权的敏感，一方面也在圣经学术史上呈现出圣经与国民身份和国家地位相关联的新视角：只有生活在那片土地，对土地拥有主权的人才可以敏锐的目光和富有洞察力的理解来阅读圣经，一部由同一民族在同一片土地上创造的作品。而非犹太人，甚至对写书语言缺乏了解，未在土地上耕耘的犹太人也无法抓住圣经的精髓。<sup>①</sup>

置身于圣经中提到的土地与地点，强化了本-古里安的圣经意识。在他看来，圣经使犹太人意识到民族起源和过去，以及与邻国进行的政治、军事、文化和精神斗争。<sup>②</sup> 圣经叙事传统中描写的约书亚带领古代以色列人征服迦南，<sup>③</sup> 一时间具有了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1951年，本-古里安曾声称，任何圣经评注家，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无论生活在中世纪还是在当代，都无法像以色列国防军那样来阐释《约书亚书》。<sup>④</sup> 1957年，在一次犹太研究会议上，本-古里安详述了“重写历史”的需要，强调从当代视角思考历史进程。他对学者讲，犹太研究需要根据过去十年的革命性事件来加以阐释。而过去无疑可以清楚地阐释现在，现在也可以帮助解释过去。<sup>⑤</sup>

本-古里安的强权政治、圣经先知般的演说风格与个人偏好对整个国家的圣经学界影响很大。以色列圣经研究协会在本-古里安的领导下享受了黄金时代，在传播圣经中的政治象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媒体更是喜欢渲染犹太民族重视圣经的气氛。本-古里安称圣经为“以色列人的身份证”，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他每隔两周主持一次半官方色彩的总理圣经学习小组，这一活动后来被夏加尔总统等延续下来。报纸上会登出总统、总理，以及其他要人和学者坐在桌旁，比较圣经文本的照片。《约书亚记》被当作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政治文化的中心环节。讨论主题一般围绕着本-古里安的个人兴趣展开。1959年，围绕着《约书亚记》召开了许多学术会议，《约书亚记》是本-古里安最喜欢的一部书，学者们就征服迦南、军事占领以及各个支派如何定居等问题展开热议。<sup>⑥</sup> 尽管学者们热衷于对圣经的象征性运用，把圣经中的英雄人物与时下现实联系起来，但是本-古里安对圣经的过于政

① Anita Shapira, "Ben-Gurion and the Bible: The Forging of an Historical Narrative", p. 658.

② David Ben-Gurion, op. cit., p. 287.

③ 参见《圣经·约书亚记》，见《和合本圣经》。

④ Anita Shapira, "Ben-Gurion and the Bible: The Forging of an Historical Narrative", p. 658.

⑤ Michael Keren, *Ben Gurion and the Intellectuals: Power, Knowledge, and Charisma*, p. 103.

⑥ See Michael Keren, op. cit., p. 107-108; Nur Masalha, *The Zionist Bible*, p. 125.

治化运用，令反对党，尤其是宗教界人士无法容忍，甚至遭到了知识界阶层的反对。雷博维茨教授曾对此现象做出警告，认为对圣经表面上的投入会将“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化，但是他的警告并未引起注意。

圣经在以色列国家的基础教育中仍旧占据着重要地位，早在1950年，本-古里安就提出，未来的民族教育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土地，一是圣经。“讲授圣经及其仪式膜拜被建构成以色列国家内部宗教的核心部分”。<sup>①</sup>从幼儿园到中学都是一门重要课程，在入学考试中占有很大比重。无论正统派犹太教学校，还是世俗学校都要教授圣经。不过，普通学校的圣经教育有别于宗教学校的世俗教育。在普通学校里，圣经被当作“以色列文化的基础书籍”；而宗教学校强调的是圣经的神圣起源。普通学校教授圣经的目的在于教导孩子热爱自己的家园，热爱居住在这里并且创造着这里文化的百姓；而宗教学校则教授孩子遵守戒律，并根据圣经标准来评价社会与民族。普通学校强调圣经的审美价值与文学价值，用圣经语言来丰富孩子的词汇，而宗教学校只教授语言和经学，不涉及圣经的文学价值。<sup>②</sup>

普通学校的教育理念，实际上顺应了20世纪20年代伊舒夫时期以来的反大流散教育。其核心在于否定流亡历史，否定旧式犹太人，倡导以色列年轻一代成为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所希望的希伯来新人：英勇、强悍、随时可以为民族和国家利益献身。<sup>③</sup>在反大流散背景下，许多以色列人将姓氏希伯来化。圣经中的名字引起了百姓们的关注。一般性的犹太名字——以圣经中先父和先母的名字命名，如摩西、亚伦、约书亚、撒母耳、所罗门、大卫、以利亚等被但、塔玛、阿摩司和基甸等名字取代。

以色列是个充满争议的国家，即使在本-古里安和国家教育机构强调反大流散教育时，依然有人呼吁与大流散历史建立联系。1955年，以色列议会在一份官方计划书中加进了要在学校强化以色列年轻人的犹太意识的规定。计划书指出：在以色列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中，都要强化年轻人的犹太民族意识，植根于犹太民族的去与历史遗产，强化其对世界犹太

---

<sup>①</sup> Baruch Kimmerling, *The Invention and Decline of Israelin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 103.

<sup>②</sup> J. Schoneveld, *The Bible in Israeli Education*, Assen/Amsterdam: Van Gorcum, 1976, pp. 1-2, 107-108.

<sup>③</sup> 关于反大流散教育问题的理论探讨，参见钟志清：《旧式犹太人与新型希伯来人》，载《读书》2007年第7期，第64~71页。

人的道德联系。<sup>①</sup> 为贯彻这一主张，圣经教育就要强化在大流散文化传承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摩西五经》的内容，而不仅仅强调历史书和先知书的内容。在 1963 年的作家大会上，作家哈扎兹攻击本 - 古里安的观点，指出东欧犹太生活乃是学习圣经的场所，是犹太精神力量的源头，认为圣经不会给新国家带来任何益处，让犹太人成为永恒民族的不是圣经，而是口传律法。<sup>②</sup>

与此同时，圣经在以色列的文化生活中的位置也有所提升，甚至在庆祝建国十周年之际的 1958 年，还举行了圣经竞赛，与“独立日”举行伞兵比赛相提并论，诞生了“圣经冠军”这样的新英雄。至于竞赛的目的，正如以色列圣经研究会主席格瓦亚胡所言，在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增加整个民族的圣经知识。甚至希望通过测试看到民族精神复兴的前景。但是，另有许多人质疑圣经测试的教育价值，称其不过是在死记硬背。<sup>③</sup> “六日战争”以后，圣经教育主要以讲解评注为主，后逐渐把圣经当成宗教文本对待，令世俗化的以色列年轻人十分厌倦。

另一个借助圣经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联系、把圣经历史当代化的重要事业是考古挖掘。圣经考古学创立于 19 世纪。自 1948 年战争以来，以色列对圣经考古制品的痴迷在世俗民族主义集体身份的塑造与犹太复国主义民族建立的过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sup>④</sup> 1948 年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的著名将领伊戈尔·亚丁在战后成为一名专业考古学家，把圣经过去与现代以色列国家、古代以色列战争与现代以色列战争联系起来。达扬将军则当了一位业余考古学家，撰写了《与希伯来圣经一起生活》。<sup>⑤</sup> 考古的目的原本在于巩固圣经作为历史来源的地位，但最后导致对圣经历史来源是否准确这一命题产生疑问。事情起因在于，1999 年 10 月 29 日，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著名的考古学家赫佐格教授在《国土报》发表题为《圣经：没有实地发现》的文章，认为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古代以色列人没有在埃及生活，没有在沙漠中漂泊，没有用军事武装征服以色列地，没有以色列十二指派定居。甚至连显赫一时的大卫和所罗门王国只不过是小小的部落王国而已。没有迹象表明耶路撒冷在

① J. Schoneveld, op. cit., p. 114.

② Anita Shapira, “Ben - Gurion and the Bible: The Forging of an Historical Narrative”, p. 664.

③ Ibid., p. 25.

④ 关于圣经考古在以色列民族国家创建过程中的意义，可以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两大族裔学者的论证中均可找到丰富的材料，限于该论题并非本文的中心论题，这里暂不做过多的展开。

⑤ Moshe Dayan, *Lehyot 'Im Hatanakh'*, Jerusalem: 'Edanim, 1978.

大卫和所罗门时代是一座大都城。<sup>①</sup> 即便在基督教领域，这种质疑也非同小可，会导致对圣经的新的阐释。而在以色列，怀疑圣经史实的确定性势必会削弱犹太民族主义和以色列人身份的基础，甚至否认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土地所拥有的权利。<sup>②</sup> 一时间，圣经再次成为以色列文化生活领域的一个热点。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圣经学者的讨论从某种程度上把圣经从民族宗教的神坛再次带入世俗之中。<sup>③</sup>

新世纪以来，圣经依旧没有退出以色列的政治舞台，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强烈地出现在以色列公共对话中，并且拥有情感力量，可引起政治与思想的联想。一个重要的新变化是，尽管政治上的极端主义者与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仍旧纠结于圣经的地理学意义，但是政治家、公民社会活动家和知识界人士逐渐将关注视角从地理学意义上的圣经转向社会学意义上的圣经。比如，一些主张社会正义的人士把圣经律法作为依据，对社会不公和某些畸形的社会现象加以抨击。有些学者甚至从经济学理论出发提出犹太教对贫困人士表示关心，似乎可以帮助消除因分配不均而造成的贫困。但这种说法显然有其偏颇之处，因为个人权力与经济平等等问题在圣经律法和拉比犹太教精神中拥有特殊含义。<sup>④</sup> 不过，上述问题确实意味深长，可以促使当今学者进一步思考。此外，圣经在当今以色列国家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占据着特殊意义。当今以色列犹太人的许多重要节日，如纪念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逾越节和住棚节（见《出埃及记》），纪念波斯犹太人免遭哈曼屠戮的普珥节（见《以斯帖记》），以及犹太新年（见《利未记》）等均可在圣经中找到出处。在这些节日上，要唱诵源自圣经的诗文，这些表面看来祛政治化的圣经原型一方面是在延续犹太传统文化，一方面却与蕴含着政治含义的国家创立与建设神话结下了不解之缘。<sup>⑤</sup>

① <http://www.freerepublic.com/focus/news/704190/posts>, 2014-01-10.

② Zeev Herzog, "Hatanach: Ein Mintzaim Bashedah", *Haaretz*, Oct. 29, 1999.

③ Anita Shapira, "The Bible and Israeli Identity", p. 41.

④ 参见范妮亚·奥兹的最新研究成果："Political uses of the Hebrew Bible in Current Israeli Discourse: Transcending Right and Left",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Vol. 25, 2011, pp. 11-15, 21-25.

⑤ "以撒献祭"见于《创世记》第22章，说的是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献唯一的爱子以撒作为燔祭，考验其是否忠诚，最后又派天使用羊羔代替以撒。在国家创建的语境下，文化学家往往把以撒被比作为国家利益而牺牲的人，将其视为找不到替罪羔羊的牺牲者。

## 结 论

在过去的百余年间，古老的圣经经典在以色列国家创建与国家建设的现代进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18 世纪犹太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开始借助回归希伯来语圣经、建构圣书、圣地、与圣民想象，以期复兴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19 世纪末期以来犹太复国主义者运用圣经将犹太人、圣经所使用的语言——希伯来语与土地联系起来，目的是为现代犹太人能在巴勒斯坦立足找到合法性的依据，犹太复国主义教育家讲授圣经是为了讲述民族历史，使年青一代了解古代民族历史的辉煌，而不是传播宗教知识，这样的教育理念与犹太正统派的圣经宗教教育发生抵触。以色列建国后，圣经当中的历史叙事与征服主题有助于以色列政府鼓舞民族士气，保证国家安全，使国家合法化，学习圣经历史一度成为国家行为。

从疆域上看，以色列人在 1967 年“六日战争”之前始终未能踏上希伯来民族的摇篮——圣经中所述古代犹大和撒玛利亚的土地。换句话说，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建立的国家是在沿海地带，从未深入到昔日撒玛利亚和犹大王国的核心地带，或者说“圣地”（Holy Sites）。<sup>①</sup>“六日战争”标志着以色列国家和巴勒斯坦民族的历史转折。伴随着这场战争的结束，以色列人占领了耶路撒冷老城、希伯伦和伯利恒等这些只从圣经中提及的古迹。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尤其是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信仰团体（Gush Emunim）甚至把国家疆域的扩大当作弥赛亚复国。<sup>②</sup>而对于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新以色列人来说，踏上了圣经中所记载的历史古迹毁坏了对圣经的浪漫追忆：因为多数“圣地”上居住着另一个民族。<sup>③</sup>借助圣经圣典建立起来的乌托邦想象无法缓解时下必须正视的阿以矛盾与冲突。家园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对此，当今最有影响力的以色列希伯来语作家、素有“以色列良知”之称的阿摩司·奥兹不禁发出慨叹，“国家为我毁坏了家园。”<sup>④</sup>

① Baruch Kimmerling, *op. cit.*, p. 102.

② Nur Masalha, *The Bible & Zio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2007, p. 136. 关于信仰团体的中文论述，参见汪舒明：《信仰者集团的崛起及其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载《西亚非洲》2006 年第 6 期，第 47～52 页。

③ Anita Shapira, “The Bible and Israeli Identity”, p. 32.

④ Amos Oz, *Mi - Mordot ha - Levanon*, Tel Aviv: Am Oved, 1987, p. 215.

可见，无论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建国大业，还是对新以色列国家的意识形态建构，圣经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当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梦想化作了现实，逐渐将新建的民族国家稳固下来，圣经的世俗象征意义便被削减，失去了其在塑造以色列人身份时的中心地位。随着全球化语境下各种价值观念的冲击，单纯的宗教圣经文本也便失去了其优势，圣经在以色列民族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便逐渐弱化。而新世纪以来，由以色列考古学家赫佐格教授引发的关于圣经史实确定性问题的争议使圣经再度成为政界、学界与公共对话的一个焦点，在宗教与世俗领域均发挥着作用。

## **The Bible and the Building of Modern Israeli Nation – State**

*Zhong Zhiqing*

**Abstract:** Hebrew Bibl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building of modern Israeli nation – state. Starting from the Haskala movement (or Jewish Enlightenment) in the 18th century, the European Jewish thinkers changed the status of the Bible from a Holy book to a profane or worldly document. This changing status of the Bible helped to make the link between European Jewry and the revival of Jewish cultural tradition, and even between the Jewish people and Palestine. After the rise the Zionist move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Bible was gradually more secularized and politicalized by some nationalist and Zionist educators who tried to create a legitimiz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In the formative years of Israeli statehood when David Ben – Gurion and other political leaders began t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the Bible in the state politics and national education. After the Six – Day War, the historical and profane meaning of the Bible was gradually lessened. Since the turn of the new century, the Bible has brought a new attention both in the intellectual circles and in public dialogue following the controversies of the facts of the Bible aroused by archeologists.

**Key Words:** The Bible; Zionism; Israel; Nation – State Building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